

# 垂衣裳而天下治： 明代政治秩序的创构与维护

## ——读《明代服饰研究》

Noninterference: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olitical Order in the Ming Dynasty:  
Reading “Research of Dress in the Ming Dynasty”

陈 奉  
*Chen Fe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13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三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代政治秩序的创构与维护

## ——读《明代服饰研究》

Noninterference: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olitical Order in the Ming Dynasty:  
Reading “Research of Dress in the Ming Dynasty”

陈 奉

Chen Feng

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日用生活品。服饰除用来遮蔽和保护身体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这就是社会标识功能。通过一个人的服饰，可以大致看出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服饰是“深深根植于特定文化模式中的社会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服饰，每逢改朝换代，首先便要“易服色”，以宣示新朝的正统性。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王朝，也是中国汉文化礼制集大成发展和政治秩序创新的一个时代。其开创者朱元璋虽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但却是一个富有政治远见和智慧谋略的开国之君，他以治国安邦和江山社稷永固为己任，终其一生都在谋划制度建设，强化政治秩序，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圣明君主之一。朱元璋在制度创新和秩序维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执着，超乎想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创立大明王朝之后，朱元璋一方面认真总结汉唐以来的治国经验和模式，另一方面反复思考元朝“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兴衰原因和教训，效仿汉高祖，将毕生精力投入元朝旧制的改革与新秩序的创建及完善之中，所以更有作为和建树，影响极为深远。

同历史上的开国明君一样，朱元璋深悉“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真谛，通过研究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他认为服饰具有别衣冠、辨尊贵、明等威的多元功能，是认定社会各阶层角色身份的标识，在确立和维护政治秩序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定格作用，所以在他所主导设计的制度体系之中，创构新的政治制度模式和礼仪教化秩序，则是他特别注重的两大方面，而明代服饰制度的革故鼎新正是应这种政治理念而同步展开推进的。明代服饰制度确立后，被载入典章规制和《大明律》之中，成为继任者奉行不替的“范本”和“祖训”，虽然在永乐和嘉靖时期对一些内容作了修订补充，但这不仅没有背离洪武时期所确立的根本宗旨和内在精神，而且强化了服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中的重要意义，进而成为明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王熹博士的《明代服饰研究》一书，以《明史·舆服志》为根据，综合前人已有研究成果，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参考各种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着力从源头上探讨明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修订及完善的因果关系，阐述了服饰在构建和维护等级社会方面的发展轨迹，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各阶层服饰的社会时尚，以及显现的多样性特点与发展趋势，揭示了服饰制度与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为感知明代服饰制度的特殊重要性提供了别样的历史视角。该书是有关明代服饰研究的第一部断代史著述，

其论述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系统梳理了明代服饰研究的基本情况，肯定其进展与成果，指出其不足与问题，明确研究方向和目的。近百年以来海内外学者研究明代服饰的论述取得一定成绩，从研究问题看，有的侧重于典制的前后变化，有的侧重于服饰式样、质地和工艺美术，有的侧重于服饰衣料的织造工艺与技术，有的侧重于服饰种类、色彩和图案纹样的变化，有的侧重于地域史范畴，有的侧重于政治史和社会史，有的侧重于少数民族服饰，但不够全面；从成果形式看，大多散见于专门通史的有关章节或地域史专论中，也有数量可观的论文发表，但散而杂，不够系统；从研究深度和力度看，有的论述试图将服饰与政治的发展走向、法律控制的松弛、商品经济繁荣与发展、社会转型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士民阶层的兴起、各种社会思潮的流行与商人势力的崛起等因素联系起来加以审视和解构明代服饰制度，虽说多少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但就整体来看，明显存在研究“碎片化”或“浅尝辄止”的倾向，多数论述不是停留在就制度论制度，就是以问题而论问题，不够深入，轮廓不清，甚至有的论述处在填补纵向记述内容的层面上，只是转录《明史·舆服志》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挖掘、理论方法以及深入研究“文化背景”方面下工夫，对服饰与构建明代政治秩序之间的论述不到位，也没有将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断代而加以总体论述。该书认为，朱元璋强化等级森严服饰制度的政治意图与动机、明代服饰与历代服饰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明代服饰的地理分布状况与时代特征，明代军服、卫所官兵服饰风尚与所在地服饰风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彼此影响，明代中后期官员服饰与中后期有关商贾阶层服饰的式样、服饰心理和理念，士民与庶民阶层在明代服饰奢靡、僭越逾制等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明代少数民族服饰与朝廷服饰制度的关系等问题，都是明代服饰研究应加强和深入研究的重点和薄弱环节。因此该书从纵向和横向的层面，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力求复原明代服饰制度的原貌，并对其功能作用等命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

其次，以《明史·舆服志》史料为线索和根据，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明代服饰制度发展的基本脉络作了论述。朱元璋确立的服饰制度是从变革“胡风”“胡俗”，恢复汉唐宋制度拉开序幕的。他认为构筑“辨贵贱，明等威”的社会秩序，确立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并付诸实践检验是治国的当务之急，故从建国开始他就极力推进此项建设。这一过程与政治制度创建同步进行，由上而下，从帝后宗室、文武百官命妇，到卫所官兵、庶民百姓，渐及乐妓、僧道、农夫、商贾等各个阶层，各项规定屡经修改和完善。从规定内容看，制度设计包括冠服至鞋履、首饰、巾帽暖耳、伞盖，以及面料、样式、尺寸大小、颜色等多方面，由简到繁，无所不包，可谓煞费心机，无所不用其极。但从权威正史《明史·舆服志》的记载看，有关服饰制度的修订过程、前因后果及发展变化的内容，不是残缺不全、遗漏未记，语焉不详，就是过于简略，难窥其全貌。若将此再与其他官史私人文献相比较，发现很多内容，如历代官员赐服的记载既不全也不系统，缺漏甚多；军士服饰简略而不详，无从得悉其概况、演变及其特点；外藩君臣冠服也仅仅是朝鲜、琉球国王服饰礼仪及赐服的片面和不准确的记载，且缺少藩属国赐服的主要内容，挂一而漏万，而对众多边疆少数民族赐服更是只字未提，甚至有的记载与诸多文献相左，错讹不少，需要搞清楚和考辨的问题多多。该书以《明史》所载为主线，参考各种官私文献资料，对明代帝后、宗室、官员、内臣、命妇、仪宾及内外官亲属、庶民等服饰的规定内容、修订变化与前后特点等问题都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和论述，明其源、辨其流、探其因果，正其名实，并以较

扎实的资料和丰富的内容,拾遗补缺,去伪存真,呈现了明代服饰演进的全景图画,从而也为明代服饰的综合研究提供了素材和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再次,以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弥补了正史中关于军服、赐服以及内地和边疆地区服饰内容的缺漏和不足。该书第四章“军服”,记述了侍卫将士、卫所边镇军服以及其材质和式样,并对军服的配备制度、军装、铠甲和盔甲的制作材料、工艺特点与实用性作了分析和探讨,丰富了军服记载的内容,避免了以往军服研究只注重解读遗存实物或“看图说话”式的模式,将历史文献记载与实物或图样研究相互参照,更具说服力和文化意蕴。赐服是明代国家治理中常见的一种政治手段,也是一个特殊机制,在维护政制运作的润滑剂、怀柔笼络藩属国和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制定外交与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举足轻重。第五章“赐服”,对明代政务、外交和少数民族边疆治理中的赐服制度作了分类和系统勾勒,认为明代政务赐服类型可分为即位、纂修实录玉牒、经筵、视学、耕藉、册立东宫、亲王宗室、文武官员、战功赐服等九类,认为其涉及范围之广、赐服之繁、规定之细和持续时间之久都是世所罕见的。明代服饰制度规定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官员和地区,但他们却是赐服的受益者,该书不仅对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奴儿干都司、西北关西七卫所、乌斯藏朵甘僧俗官员、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湖广腹地土官等赐服内容作了系统记载,而且书中所附明代归附来降蒙古首领及其所属和鞑靼、瓦剌与俺答各部首领遣使朝贡赐服两表,按编年系统整理了有关赐服的资料,为研究明代统治者的民族和边疆政策,提供了文献依据和参考。明代朝贡藩属国和外交赐服的主要对象包括亚洲地区的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众多国家和地区,该书对这些内容也有详细的论述。有关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服饰内容,作者利用丰富的明代地方志资料,分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江西、浙江、广东等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几个部分,着重对不同历史时期各地服饰风尚所发生的变化、由俭入奢的社会背景及其影响作了初步探讨。上述这些内容既充实了正史有关“赐服”记载的不足和缺漏,也深化了有关内容,拓展了研究视野。

第四,以实证和综合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着重对各阶层服饰制度确立的过程、服饰在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层服饰以及地域服饰的时尚变化趋势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明确指出,帝后服饰系列的确立都能从历史上找到源头和理论根据,认为明代统治者从恢复汉唐服饰的传统实践以及明代构建等级社会需要出发,不仅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礼制的正统性,确立了朱氏王朝的权威性,而且实现了服饰制度在维护政治秩序方面的威慑效应。强调明代官员服饰的时代特点在于官员服饰制度的重新构建,标识性特点体现在官员服饰“补子”图案的确立,等级性表现为以服饰式样定尊卑高下,制度特点是以服样定纲纪等四个方面。在论述庶民服饰时,该书对明代男女服饰式样、服饰纹样图案的审美情趣和选材作了翔实记述,同时侧重对各地着装多样化与时尚潮流以及挑战朝廷规定追求个性的实况作了系统描述和分析,认为明代统治者极力限制庶民百姓享有服饰自身特色与个性化的初衷,就是想规范庶民百姓的行为举止符合政治秩序的构建要求,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从明代庶民服饰的社会发展趋势看,明代初期达到了这样的预期社会效果,各地庶民百姓服饰是循规蹈矩的,符合简约的要求和标准,然而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社会干预和控制能力的减弱、法律控制的松弛、社会阶层流动的活跃、异端思潮和市井文化空前繁荣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审美观的多元化,庶民服饰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发展格局,则构成了

明代庶民服饰发展最亮丽的风景图画，这也表明统治者强加给庶民百姓的服饰制度、以封建礼制和纲纪为核心、以尊卑贵贱为标志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受到质疑和挑战，服饰制度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了。此外，对明代地域服饰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也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认为明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中心的南北直隶，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服饰风尚都经历一个从初期循礼俭约收成到中后期僭越逾制、多样发展的过程，这与国家秩序弱化、干预导向作用不力及经济社会多元发展有密切关系。

第五，论述了服饰与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民族、外交以及地理气候风俗等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作者认为，明代服饰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制度的制定、实施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层面上；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礼仪规范与经济生活的互动，以及经济发展对等级服饰制度固定模式的不适应与冲击变革的层面上；与军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军服制度特有的属性对军事斗争所产生的特定功能效应的层面；与民族政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文化的多元性与民族服饰特征的统一性、服饰制度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包容性、共荣性诸多作用影响的层面上；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中外服饰文化的交流与互相影响的层面上；与科技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的物质性、科技含量在展示服饰功能的手段和途径上的张力作用的层面上；与气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与服饰制度本身在气候因素的作用下、服饰和服饰制度如何保持礼仪规范，因时因季而变的调适层面上；与地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与服饰制度，在不同地域所展示的多元性、协调性、差异性特色的层面上。作者的这些论断，是他长期从事明代社会生活史的体会和感受，对深入研究明代服饰还是有启发作用的。他参与出版的著述有《中华文明史（明代卷）》《中国明代习俗史》《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明代风俗通史》《明代宫廷典章史》等多种，研究明代服饰有一定的基础。当然瑕不掩瑜，本书偏重文献的考证与论述，图文对照不够充分，书中缺少彩色图版；对海外东亚及欧美等中国学有关成果的关注和梳理也有欠缺，对一些出土实物或图像考古资料尚有待充实，对一些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之间的差异性少有比较，此当为今后补充完善的地方。总之，《明代服饰研究》作为第一部断代史服饰著述，反映了当前明代服饰研究的新进展，值得推荐和介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